

制度促进收入增加的理论分析:AS-AD 视角

严成樑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基于 AS-AD 模型,从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个角度考察了制度对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质量越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越多,从而总需求越多;制度质量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高,通过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均衡就业越多,从而总供给越多。上述两个机制决定了制度质量越高,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均衡收入水平越高。提高制度质量对于扩大有效需求,促进供给增加,进而实现收入增加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制度;收入;AS-AD 模型

[DOI 编码] 10.13962/j.cnki.37-1486/f.2015.01.003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10(2015)01-0019-07

一、引言

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重点。根据 North(1990)^[1]、Acemoglu et al(2001^[2],2003^[3],2005^[4])的观点,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原因。好的制度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坏的制度则会对生产起到阻碍作用。尽管一些经济学者强调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劳动投入增长等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在制度经济学家看来这些其实都是制度作用的结果。Acemoglu et al(2005)^[4]以朝鲜和韩国为例说明了制度对收入和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性。20 世纪 50 年代朝鲜和韩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体相当,但到 21 世纪初时,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有很大的差距。Acemoglu et al(2005)^[4]认为朝鲜和韩国发展的差异归因于两个国家制度的差异,朝鲜推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韩国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调节经济运行。关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等一

系列制度创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

以往的研究强调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 Chow 和 Lin(2002)^[5]、杨建芳等(2006)^[6]、郑京海等(2008)^[7]、严成樑(2011)^[8]。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李富强等(2008)^[9]的研究表明,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最主要的推动力。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陈刚(2011)^[10]研究发现,制度是决定本地 R&D 效率和 R&D 溢出效率的基础性因素,产权制度越完备的地区,本地 R&D 资本和国外 R&D 资本的溢出效率越高。方颖和赵扬(2011)^[11]的估算表明,产权保护程度上升 1%,我国经济增长率可上升 4.23%,且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樊纲等(2011)^[12]认为我国市场化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扩大文化消费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2&ZD028)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R&D 驱动经济增长模型的拓展和应用研究”(项目编号:7120117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严成樑(1980-),男,山西平遥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

进程的不断推进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从 1997 年到 2007 年,市场化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 1.45 个百分点。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经济效率,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39.23% 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严成樑、沈超(2014)^[13]认为制度质量提升是熨平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

关于如何衡量制度变量是经济学的重点和难点,现有研究通常用国有企业增加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来衡量制度,也有学者通过产权保护程度来衡量总体制度。事实上,上述指标都只是制度的一个方面,并不能反映全部的制度。樊纲等(2011)^[14]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状况、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以及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构建了我国的市场化指数,他们的指标能更好地反映我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环境。图 1 是根据樊纲等(2011)^[14]的市场化指数做的我国 31 个省份(市、自治区)1997 年、2003 年和 2009 年制度质量分布的核密度图。可以看出,我国制度质量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质量分布出现明显的向右偏移,且波峰高度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说明以较高概率密度对应的制度质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且较低水平制度质量的概率密度在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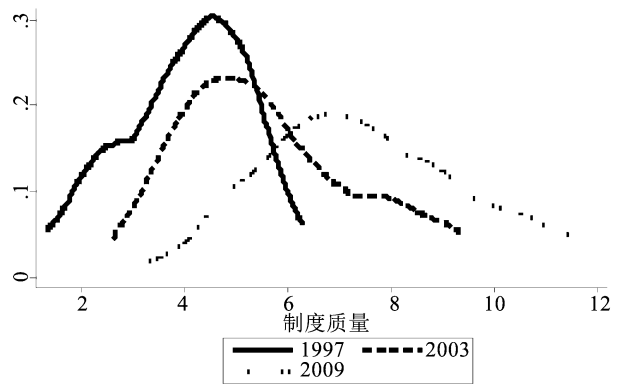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省份制度质量分布的 Kernel 密度图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不同省份的制度质量差别较大,表 1 给出了樊纲等(2011)^[14]估算的 2009 年我国 31 个省份制度质量以及制度质量在全国省份中的排名。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东部沿海省份制度质量较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省份制度质量最低。

东部地区除河北和海南制度质量较低外,其余省份都较高。西部地区除重庆和四川制度质量较高外,其余省份的制度质量都处于较低水平。中部省份制度质量总体介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制度质量最高的浙江省得分为 11.80,而最低的西藏得分仅为 0.38。

表 1 2009 年我国 31 个省份制度质量及其在全国的排名					
东部	制度质量	中部	制度质量	西部	制度质量
浙江	11.80(1)	河南	8.04(11)	重庆	8.14(10)
江苏	11.54(2)	安徽	7.88(12)	四川	7.56(15)
上海	10.96(3)	湖北	7.65(13)	内蒙古	6.27(20)
广东	10.42(4)	江西	7.65(14)	广西	6.17(21)
北京	9.87(5)	湖南	7.39(16)	云南	6.06(24)
天津	9.43(6)	吉林	7.09(18)	宁夏	5.94(25)
福建	9.02(7)	黑龙江	6.11(22)	陕西	5.65(26)
山东	8.93(8)	山西	6.11(23)	贵州	5.56(27)
辽宁	8.76(9)			新疆	5.12(28)
河北	7.27(17)			甘肃	4.98(29)
海南	6.40(19)			青海	3.25(30)
				西藏	0.38(31)

注:括号内表示该省份制度质量在全国 31 个省份的排名。

制度是影响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图 2 给出了根据樊纲等(2011)^[14]估算的制度质量与人均收入的散点关系图,其中横轴表示制度质量,纵轴是人均收入取自然对数值。可以看出,散点图对应拟合线的斜率严格为正,即人均收入与制度质量严格正相关,制度质量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基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一些学者考察了制度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并尝试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化。这些研究认为,制度通过提高资本、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从而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需要说明的是,在经济增长框架下,经济增长率与收入水平主要是由总供给决定的,即技术水平越高、资本越多、劳动力越多,对应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越高。事实上,现实经济中均衡收入水平不仅取决于总供给,而且取决于总需求,均衡收入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结果。例如,假设经济中的生产能力很强,产品供给过多,但市场消费需求不足,这会导致产品积压,从而影响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最终影响均衡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是需求不足和供给相对过剩,其通过构建凯恩斯交叉图对这一现象给出解释和说明。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强调扩大内需的原因,市场需求越旺盛,企业利润越高,其

会扩大生产规模,这又会拉动投资、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即需求对供给有拉动作用。因此,在研究均衡收入水平决定时,我们既要强调增加总供给的根本作用,但也不能忽略扩大总需求对收入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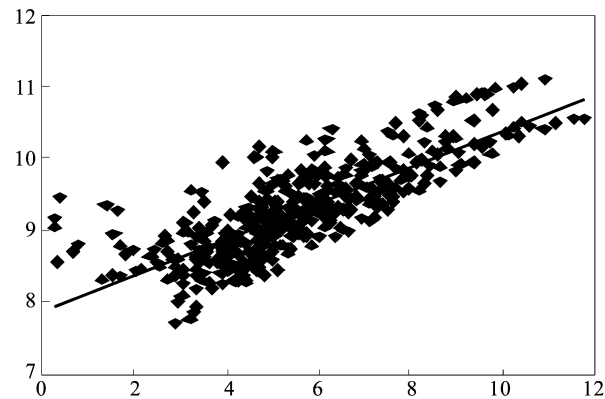


图2 制度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散点关系图

AS-AD(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经济学家通过AS-AD模型分析供给冲击或是需求冲击对均衡收入、利率、价格和就业水平的影响。AS-AD模型认为均衡收入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相对于经济增长模型,AS-AD模型不仅可以考察制度通过供给渠道对经济的影响,而且可以考察制度通过需求渠道对经济的影响,其分析更全面。为此,本文在AS-AD模型框架下考察制度质量对收入的影响。在本文的框架下,制度质量对消费需求 and 投资需求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制度质量越高,经济中的总需求越多。制度通过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制度通过增加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对均衡就业有拉动作用;上述两方面表明,制度质量越高,经济中的总供给越多。综合上述制度对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影响可知,制度质量越高,通过AS-AD模型决定的均衡收入水平越高。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对总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制度对总供给影响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是制度对均衡收入的影响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语。

二、制度对总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根据AS-AD模型,总需求曲线是通过IS-LM模型得到的。我们在IS-LM框架下引入制度,通过分析制度对IS-LM模型的影响,进而分析制度

影响总需求的作用机制。

(一)产品市场均衡

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消费取决于可支配收入。现实经济中,制度也是影响人们消费的重要因素,制度质量越高,人们的预期收入越高,从而选择更多的消费;制度质量越高,人们消费越有安全感,从而选择更多的消费。为此我们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消费函数,将消费函数拓展为 $C(Y-T, \theta)$,其中 $Y-T$ 表示可支配收入。通常地,边际消费倾向在0到1之间, $0 < C_1(Y-T, \theta) < 1$;制度对收入有拉动作用, $C_2(Y-T, \theta) > 0$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通常设定,投资取决于实际利率,利率是投资的机会成本。现实经济中,制度也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我们将制度引入投资函数,从而投资函数修正为 $I(r, \theta)$ 。其中, r 表示利率, θ 表示制度。利率越高,投资机会成本越高,投资越少, $I_1(r, \theta) < 0$;制度质量越高,企业投资越有安全感,经济未来的预期越好,投资越多, $I_2(r, \theta) > 0$ 。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封闭经济框架,不考虑产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在该框架下,经济中的总需求包括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购买 G 。产品市场均衡是产品供给与产品需求的均衡关系,我们可以构建如下的产品市场均衡关系:

$$Y = C(Y-T, \theta) + I(r, \theta) + G \quad (1)$$

(二)货币市场均衡

所谓货币市场均衡,是指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相等。我们用实际货币余额 M/P 表示货币供给,宏观经济分析中通常假设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根据通常的设定,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利率和可支配收入。利率越高,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越高,从而人们倾向于减少货币持有;收入越高,人们的消费需求和交易需求越大,从而倾向于持有更多的货币。现实经济中,制度可以影响货币需求,制度质量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制度质量越高,人们的交易需求和消费需求越高,从而货币需求量越大;另一方面,制度质量越高,利率越高,人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越高,从而货币需求越小。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制度对货币需求的上述两种效应正好相互抵消,从数量角度分析,制度不影响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函数为 $L(r, Y)$,其中 r 表示利率, Y 表示收入。

根据上述分析,货币需求函数满足 $L_r(r, Y) < 0, L_Y(r, Y) > 0$ 。货币市场的均衡关系是:

$$M/P = L(r, Y) \tag{2}$$

(三)制度对总需求的影响

总需求曲线是通过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推导得到的。在上述框架下,制度作为外生变量,通过影响产品市场均衡进而影响总需求。图 3 给出了 IS-LM 框架下制度对均衡收入的影响,图 4 给出了制度通过影响 IS-LM 进而影响总需求曲线的位置。可以看出,制度质量越高,IS 曲线向右移动,通过 IS-LM 模型决定的均衡收入水平越高,对应图 4 的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相应的作用机制是,制度质量越高,经济中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越多,从而总需求越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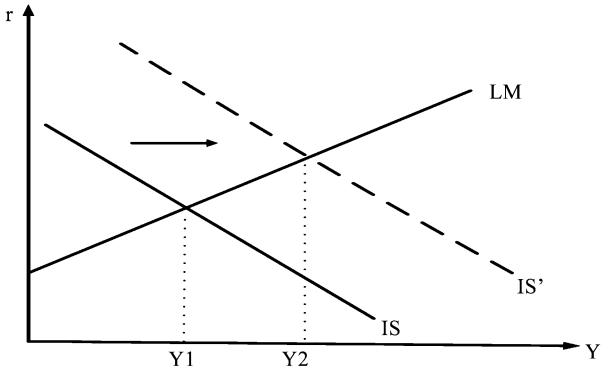


图 3 制度质量上升对 IS-LM 模型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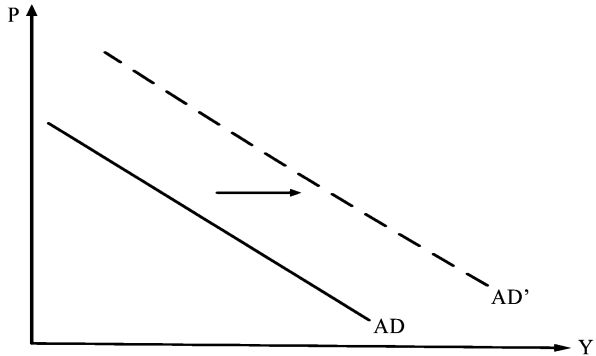


图 4 制度质量上升对总需求的影响

三、制度对总供给影响的理论分析

根据 AS-AD 模型,总供给是通过总产出函数和劳动力市场均衡决定的。我们在上述框架下引入制度,通过考察制度对总产出函数和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进而分析制度对总供给的影响。

(一)总产出函数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通常设定,资本和劳动是产

出最基本的决定因素。除资本和劳动外,我们假设制度也是影响产出的重要因素,制度质量越高,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越高,实际产出越多。本文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从而拓展的总产出函数为:

$$Y = F(\bar{K}, L, \theta) \tag{3}$$

其中, \bar{K} 表示资本, L 表示劳动。简化起见,我们假设资本 \bar{K} 外生给定。根据生产函数的通常性质,劳动边际生产率严格为正,且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随劳动投入的增加而严格递减,从而可知 $F_L(\bar{K}, L, \theta > 0, F_{LL}(\bar{K}, L, \theta) < 0$ 。制度边际生产率严格为正, $F_\theta(\bar{K}, L, \theta) > 0$ 。制度质量越高,企业生产能力越强,生产函数边界外移,制度质量上升对总产出函数的影响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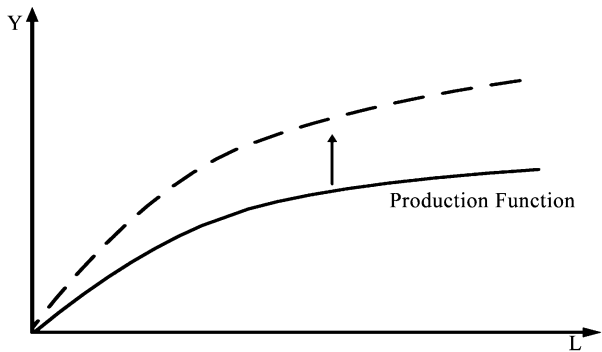


图 5 制度质量上升对生产函数的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均衡

劳动力市场包括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其中劳动需求是厂商的决策,劳动供给是家庭决策,均衡劳动数量是由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共同决定的。我们通过分别考察制度对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而考察制度对均衡就业的影响。

1. 劳动需求

在价格总水平 P 和名义工资率 W 外生给定的前提下,厂商通过选择雇佣最优的劳动数量以极大化自身利润,厂商的优化问题是:

$$\max \{ PF(\bar{K}, L, \theta) - WL \} \tag{4}$$

通过求解上述最优性问题可以得到厂商对劳动的需求函数:

$$W/P = F_L(\bar{K}, L, \theta) \tag{5}$$

我们假设 $F_L(\bar{K}, L, \theta) = f(L, \theta)$ 。根据生产函数的性质可知 $f_1(L, \theta) < 0$, 即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随劳动投入的增加而递减; $f_2(L, \theta) > 0$, 即劳动和制度

具有互补性,制度质量越高,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越高。将上述假定与方程(5)结合起来,从而将劳动的需求函数表示为:

$$W = Pf(L, \theta) \tag{6}$$

2. 劳动供给

劳动供给是个体行为,个体通过选择消费 C 和休闲 $(1 - L)$ 以极大化自身福利。假设个体总的时间禀赋为 1, L 表示劳动时间, $(1 - L)$ 表示休闲时间。在传统模型基础上,我们假设个体的福利定义在消费和休闲基础上,同时制度也是影响个体福利的重要原因。个体的目标函数是 $\max U(C, 1 - L, \theta)$, 制度质量越高,人们生活越有安全感,生活越幸福,社会福利水平越高,从而 $U_\theta(C, 1 - L, \theta) > 0$ 。根据上述效用函数,我们假设制度与劳动、休闲具有互补性,制度质量越高,人们消费、休闲的边际效用越高。个体每期的收入和支出相等,其面临的预算约束方程是 $C = (W/P^e)L$, 其中 C 是消费支出, W/P^e 是预期实际工资率, L 表示劳动时间, $(W/P^e)L$ 表示劳动收入。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假设个体和厂商是信息不对称的,厂商拥有完全信息,知道总体价格水平;个体信息不完全,其对应预期价格 P^e 。将预算约束方程代入效用函数极大化问题,可以将个体的优化问题转化为:

$$\max U((W/P^e)L, 1 - L, \theta) \tag{7}$$

个体通过选择劳动供给数量极大化上述效用函数,通过求解得到个体的最优劳动供给函数应为预期实际工资和制度质量的函数, $L = L^*(W/P^e, \theta)$ 。且 $L^*_1(W/P^e, \theta) > 0$, 即实际工资水平越高,个体选择提供更多的劳动; $L^*_2(W/P^e, \theta) > 0$, 制度越完善,劳动边际生产率越高,劳动供给越多。为便于图形表述,本文通过如下的反函数形式表示上述劳动供给函数:

$$W = P^e g(L, \theta) \tag{8}$$

结合劳动供给函数,根据反函数性质可知, $g_1(L, \theta) > 0$, $g_2(L, \theta) < 0$ 。根据通常的设定,我们假设预期价格是实际价格的函数, $P^e = \phi(P)$ 。随着实际价格的变动,个体的预期价格保持不变或是部分调整,即 $0 \leq \phi'(P) < 1$ 。将上述预期价格设定代入方程(8),我们可以将劳动供给函数表述为:

$$W = \phi(P) g(L, \theta) \tag{9}$$

3. 均衡劳动决定

通过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决定均衡劳动数量,根据方程(6)和方程(9),均衡劳动数量取决于如下的方程:

$$Pf(L, \theta) = \phi(P) g(L, \theta) \tag{10}$$

方程(10)决定的均衡劳动数量是外生制度质量的函数形式,制度质量通过影响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进而影响均衡就业。图 6 给出了制度对均衡就业数量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制度质量的上升,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增加,通过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均衡就业上升。相应的作用机制是,根据方程(6),制度通过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进而对劳动需求有拉动作用;根据方程(9),制度通过提高休闲的边际效用对劳动供给也有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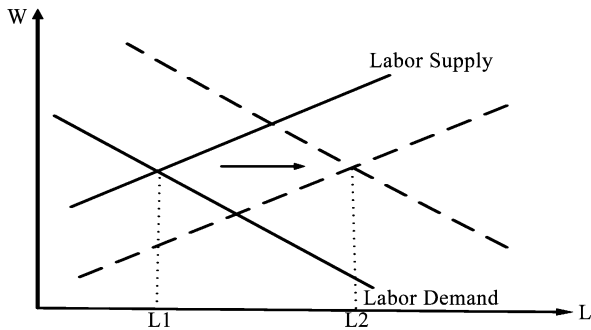


图 6 制度质量上升对劳动力市场决定均衡就业的影响
(三)制度对总供给的影响

总供给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均衡和总产出函数决定的。根据方程(10),价格水平越高,通过劳动力市场决定的均衡就业越多。相应的传导机制是,价格水平越高,实际工资率低,劳动需求越多;价格水平越高,预期实际工资率越低,劳动供给越少。由于我们假设部分预期的情形,劳动需求对均衡就业的影响大于劳动供给的影响。从而价格水平越高,均衡就业越多,总供给越多。

制度对总供给的影响是通过两方面的影响实现的:一方面,根据图 5,制度通过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对实际产出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根据图 6,制度通过提高均衡的劳动数量对经济有促进作用。就业是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就业越多,总供给越多。综合上述两种力量,制度质量越高,总供给越多。图 7 给出了制度对总供给曲线的影响,可以看出,随着制度质量提高,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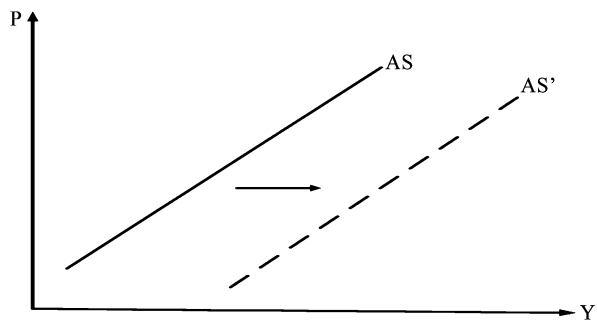


图 7 制度质量上升对总供给的影响

四、制度对均衡收入影响的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通过构建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考察制度对收入水平的影响。图 8 考察了制度质量上升通过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位置,进而影响均衡收入。根据图 4 和图 7,制度质量上升使得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同时右移,从而通过两者决定的均衡收入水平增加。相应的传导机制是,制度通过使得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增加,从而均衡就业数量越多,这有利于增加总供给;制度还通过提高企业生产能力使得总供给直接增加。制度通过消费需求 and 投资需求增加使得总需求增加。均衡产出和收入是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共同决定的,上述两种效应均使得均衡收入增加。根据上述分析,制度质量上升通过总需求和总供给两个渠道对均衡收入有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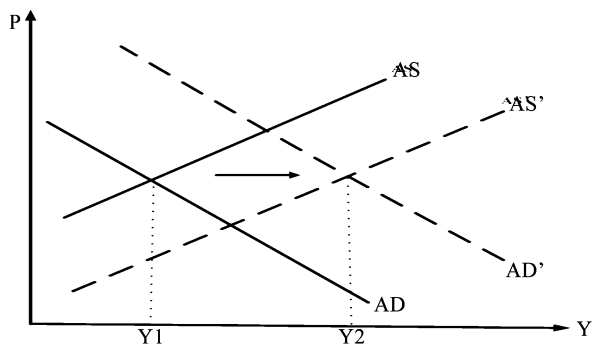


图 8 制度质量上升对总供给总需求决定的均衡收入的影响

五、结语

本文通过 AS-AD 模型考察了制度对均衡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制度通过直接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对总需求有拉动作用;制度通过促进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对均衡就业有促进作用,制度通过直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对实际产出有正向影响。综合上述两种机制,制度质量越高,通过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均衡收入水平越高。需要说明的

是,经济增长理论通常假设制度通过总供给的渠道对收入产生影响,而忽略了制度通过总需求对收入的潜在影响,这是不全面的。相对于经济增长框架而言,通过 AS-AD 模型可以更好的说明扩大需求对收入增加的重要性,有这利于更全面的分析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可以更好的认识我国当前实施的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

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制度是促进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为此,应加快制度建设,促进制度不断完善,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挥制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加强对增加供给方面制度的完善,例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研发和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加快创新进程;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加强对拉动需求方面制度的建设,例如,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社会创造良好的消费和投资环境;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加快税收制度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投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使人们敢花钱。还要强调的是,制度建设是一个方面,还要加强制度实施,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 [1] North D.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1990.
- [2]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5).
- [3]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Thatcharoen, Y. Institutional Causes, Macroeconomic Symptoms: Volatility, Crises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50 (1).
- [4]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 [M]. in Aghion P., Durlauf 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lsevier/North Holland, Amsterdam, 2005.
- [5] Chow G., Lin A. 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 (3).

[6] 杨建芳, 龚六堂, 张庆华.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06, (05).

[7] 郑京海, 胡鞍钢, Bigsten A. 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一个生产率视角[J]. 经济学季刊, 2008, (07).

[8] 严成樑. 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拓展的 MRW 框架的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06).

[9] 李富强, 董直庆, 王林辉.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J]. 经济研究, 2008, (04).

[10] 陈刚. R&D 溢出、制度和生产率增长[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07).

[11] 方颖, 赵扬. 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 估计产权保护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 (05).

[12] 樊纲, 王小鲁, 马光荣. 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 经济研究, 2011, (09).

[13] 严成樑, 沈超. 转型时期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4, (01).

[14]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宋 敏)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 on Income Incr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 – AD Model

YAN Cheng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S – AD Model, explores the growth effect of institution on incom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stitutional quality has positive effect on income through increasing aggregate supply and aggregate demand. Firstly, high institution quality increases the aggregate demand through its effect on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secondly, high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creases the aggregate supply through its effect on TFP and equilibrium employment which is determined by labor market. Combining these two effects, we find that institutional qual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quilibrium income determined by aggregate supply and aggregate demand. This paper intends to emphasis that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anding effective demand, increasing supply and thus raising the income level.

Key Words: institution; income; the AS – AD Model

